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六八期 ——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11d)

【史海钩沉】	惊动周恩来的黑龙江省两派武斗	史义军
【文革往事】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	何 平 · 王继华
【文革一页】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史实辨析】	最后的晚会——1971年五一节晚会史料辨析	张光渝
【口述历史】	专职厨师程汝明谈江青(下)	程汝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惊动周恩来的黑龙江省两派武斗

• 史义军 •

◇ “炮轰派”和“捍联总”

1967年1月16日，在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支持下，黑龙江省23个单位的造反团成立联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声称，自10日起“红色造反者”查封、接管了省、市大部分党政机关；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及所属各分局；《黑龙江日报》及其他在哈的地方报纸；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哈尔滨电视台；市长途电信局、市电信局；省人民银行、省财政厅；部分大专院校；部分工厂企业单位及其他一些单位。省委和市委发表《公告》表示支持。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召开，大会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任“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出：“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连续发布了一、二号通告，

一号通告称原省委“是黑龙江省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总根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推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对毛主席、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二号通告把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说成是“在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经验基础上，制造一种更为高级的，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政权”。3月，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批准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范正美等人为常委。潘复生在这次夺权中成了“东北新曙光”的核心人物。

在建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之初，“造反派”内部即围绕由谁掌权问题发生分歧。

1967年1月31日，哈工大发生造反团形势辩论会事件（即“一·三一”事件），潘复生调动1万多人，围攻工大主楼，造成工大造反团分裂。事后，黑龙江大学、哈军工学院、体育学院红色造反团又因原省委常委赵去非进革委会问题相继分裂为两派。反对赵去非进革委会的一派成立炮轰联络站（简称炮轰派）；潘复生则指使另一派组成“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从此，“捍”、“炮”两派的斗争遍及全省，以致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

◇ 频繁的武斗

1967年5月1日，鸡西市属“捍联总”派的“红联总”与属“炮轰派”的“第三司令部”发生严重武斗，造成9人死亡，44人重伤。

5月19日，哈尔滨港务局“捍”、“炮”两派组织之间发生大规模武斗。市革委会和太平区革委会调动近万名群众和干警，以所谓支持哈尔滨港务局红色造反团（“小红色”）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围攻港务局，与港务局港口造反团（“大红色”）的群众发生武斗。25日，市、区革委会再次调动上万名群众和干警围攻、冲击港务局，帮助“小红色”夺权，拘留了张相臣等13人，并向全市发布通告，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强加于“大红色”，诬称“大红色”制造了所谓“‘五·一九’反革命流血事件”。市革委会支一派压一派，将这次武斗定为“反革命流血事件”，并给大红色造反团一些人戴上了“反革命”、“牛鬼蛇神”和“阶级报复”等政治帽子。

6月3日哈军工“炮轰派”到省革委会办公地点门前静坐，要求潘复生、汪家道接见。潘复生派“捍联总”驱赶“炮轰派”。“炮轰派”进入院内，与“捍联总”发生武斗。

6月5日，哈军工“炮轰派”冲进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地址中山路107号与“捍联总”派在院内发生武斗。6月9日凌晨，哈尔滨“捍联总”组织2000多人，冲进哈军工院内，与“炮轰派”发生武斗，并夺取“炮轰派”掌握的学院革命委员会领导权。6月18日至1968年4月7日，汤原县属“捍联总”派的“一二·一四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与属“炮轰派”的“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先后发生10次武斗，造成24人死亡，4人致残，340人受伤。

1967年6月20日，哈尔滨“捍联总”的头头韩潮，当时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他亲自组织数千人，将集中在哈尔滨建工学院的各院、校的学生先行围困，于6月21日凌晨，开始攻打建工楼内的“炮轰派”，发生激烈武斗，20多人受伤。“捍”派占领了建工学院大楼，关押各院、校学生400多人并进行所谓的“政治审查”。这次武斗砸坏了建工学院的教学仪器和设备75种，533件（台、套）。损坏和丢失各种图书一万余册，共折合人民币5万8千余元。

7月中旬，“捍联总”对哈尔滨第一机器厂“炮轰派”实行大包围，7月18日早晨、7月

22日晚间，哈尔滨第一机器厂“炮轰派”被迫发动了两次抢粮事件。

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次日《文汇报》即披露了江青这个讲话的精神。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使全国各地武斗流血事件更加频繁，“内战”达到高潮。

8月4日至9月6日，哈尔滨“捍联总”在哈尔滨第一机器厂与“炮轰派”先后发生多次大规模武斗，不仅使用棍棒、铁矛，并动用了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炸药等武器，还出动坦克、装甲车30多辆次，致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第一机器厂是重要的兵工企业，在这次武斗中部分厂房被毁，后果极其严重。8月12日，哈工大“捍联总”在校门前与哈尔滨港务局“炮轰派”发生武斗，当场打死3人，伤100多人。此外“捍联总”为准备搞更大的武斗，由韩潮出面于8月下旬先后向省林业厅、哈尔滨工业大学、林业机械厂等单位的造反派头头游说：“哈市武装部在极乐寺的军械库存有给全市民兵的枪支，你们可以去抢。”在韩潮的鼓动下，上述单位共出动200余人、10多台卡车到极乐寺，将警卫军械库的解放军围住，将军械库门锁锯断，闯入库内，共抢去迫击炮6门、机关炮5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40余支、步枪100余支、刺刀10余把、各种子弹7千余发。

8月28日下午，哈尔滨市“捍联总”同“炮轰派”在松江罐头厂发生武斗，造成9人死亡，6人受伤。翌日，市20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集会，声讨哈尔滨第一机器厂“炮轰派”动用武器袭击松江罐头厂的罪行。大会通过了市工代会等5个群众组织联合发表的《再告全省人民书》。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捍”、“炮”两派无休止的争斗使黑龙江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 惊动周恩来

1967年9月6日晨3点20分到4点50分，周恩来、戚本禹、吴法宪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范正美、宋振业、边世军等黑龙江省炮轰派和以潘复生、汪家道为头头的“捍联总”双方全体代表。

在周恩来的调停下，9月6日达成了停止武斗的9条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坚决贯彻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用实际行动贯彻和捍卫十六条、“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停止打、砸、抢、抄、抓，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证双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

第二条，双方释放所抓的和扣押的全部人员，包括被公安机关非法拘捕的革命群众在内。

第三条，双方立即停止围攻和冲击并拆除一切武斗工事。双方的武器、弹药和一切军用装备（包括军用汽车）就地封存，限期上交。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非法戒严和划分警戒区，不得擅自宣布停工停产。

第四条，停止经济迫害，不准断粮、断水、断电，不得互相歧视、报复，不准克扣对方工资，不准搞经济主义。

第五条，坚决贯彻中央“七。一三”指示，不准以任何借口调动农民进城，不准到农村搞打、砸、抢、抄、抓，不准破坏农业生产。

第六条，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国家计划完成。凡离开本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一律都要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搞好大批判，搞好斗批改。双方都要保护返回人员的安全，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不得进行压制。

第七条，保证交通和通讯往来畅通无阻，双方不许扣押信件，不许切断和窃听电话，不许破坏交通、铁路和拦截车辆。

第八条，不要串连外地、外单位人员，参加本单位的斗批改。

第九条，中央调查组监督上述协议的执行。

协议签字后，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到哈尔滨监督调查。

但是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两派并未执行协议，武斗烽火又起。10月6日，哈师院“捍”、“炮”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手榴弹、火药枪、小口径步枪等武器，1人被炸死，40多人被炸伤，几十万元的国家财产遭到损失。10月12日，哈尔滨“捍联总”与长时间被围困在哈尔滨第一机器厂内的“炮轰派”，再次发生激烈武斗，并动用了机枪、冲锋枪和炸药。武斗中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炮轰派汇报团在北京通过联络员向周恩来汇报了这次武斗的情况。黑龙江的武斗又一次惊动了周恩来。11月24日、25日，周恩来分别接见“炮轰派”和属于“捍”派的“山上派”代表，批评黑龙江几派群众组织至今达不成协议，联合不起来。他警告造反派头头：不要把广大群众引到错误方向去，不要热衷于打内战，热衷于出风头。群众是不会跟你们走的。强调：东北三省是全国粮食、煤炭、石油的重要生产基地，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现在煤炭生产下降，粮食、石油运不出来。要求两派在一个星期内达成联合协议，尽早回黑龙江去抓革命、促生产。（1）《“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一书中也有关于这次接见的记载：“11月下旬，他对黑龙江的某‘造反派’代表说：你们东北是最冷的地方，但现在最好的煤矿日产量还不到过去一半。东北离开煤怎么行？他严词斥责几派之间的打‘内战’”。（2）

12月1日，“捍”、“炮”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为实现大联合，在北京达成《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协议》（即“十二条协议”）16日，省革命委员会决定，组成贯彻《协议》监督小组，由郭强为组长。

经过周恩来近半年的反复调停，“捍”、“炮”谈判终于进入尾声。1967年12月23日晚八时二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周恩来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吉两省各派代表。周恩来针对还有人到工厂挑起武斗，致使生产停顿，指出：我劝你们不要伸手了，让工人阶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去制造新的派别，不要再去串连了。要下狠功夫去掉小资产阶级的“私”字、派性。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宋任穷、陈锡联、潘复生等也参加了接见。（3）

此后，协议并未得到认真执行。12月中旬至1968年1月，鹤岗市发生多起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六〇炮、手榴弹和炸药，造成多人伤亡。全省其它地方也都发生不同规模的武斗。直到1968年夏，“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强调“大联合”，并随

着1967年、1968年高等院校两届毕业生分配离校，两派武斗才逐渐停息。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02页。

〔2〕《“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42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09页。

□ 原载《共识网》

~~~~~

## 【文革往事】

###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

• 何 平 • 王继华 •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 初识蒯大富

1965年，我们全系同学停课被分到北京的延庆农场搞社教运动。1966年5月13日，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们全部返校。我是社教工作队副队长，正经手一件经济案件，社教分团要我结案后再离开，为此我延迟到17日才回校。

回到学校，迎面就见到我的宿舍门口贴着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敦促何平投降书》，要我交待与学校黑党委的关系。我是党员、班干部，因工作关系与系领导、学校领导有些接触。搞社教离校一年多了刚回来，咄咄逼人地要我交待与校领导的关系，能有什么关系和问题呢？不是无中生有，也是捕风捉影，我不理睬大字报的叫嚣，放下行李、被包就去大礼堂前边看大字报，我要了解学校“文革”的形势。

学校大礼堂前宽敞的草坪现在成了清华文化革命的阵地，四周搭起长长的报栏，铺天盖地地张贴着各种观点的大字报，反对校党委的、反对工作组的、拥护工作组的，各种观点都有，这里成了清华文化革命各种信息的策源地。6月16日，有一张题目叫《工作队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引人注目，署名蒯大富。我不认识这个人，听说是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我想工作组刚进驻学校，能有什么问题呢？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还有这张大字报的火药味浓，因而引起很多人围观。几天后我去看大字报，听到一个人问：“你就叫蒯大富？”

我一听蒯大富在这里，就很有兴趣地循声望去，只见一个50来岁、干部模样的人指着对面的学生问。对方是一个戴眼镜的学生，回答说：“我就是蒯大富！”

这人就是蒯大富，我初次见识了他。只见他反问对方：“你叫什么名字？”“不告诉你。”“为什么？”“这是我的自由，现在不回答你。”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问话的人是谁，后来才知道是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他来看大字报，碰巧遇到蒯大富就辩论起来，引来一大堆的围观者。他又责问蒯大富：“工作组到学校才几天时间，你说工作组有什么问题？”“没依靠左派。”“工作组来了不就是找他们了解情况吗？”“没找我，我比他们还左，是左派中的左派。”“是打引号的左派吧！我看你是右派！”

薄一波说完就走了，他的轿车停在远处的树荫下，是一辆红旗牌轿车。我们想这人肯定不是一般干部，当时只有副总理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乘红旗牌轿车。第二天《人民日报》上登载薄一波接见古巴来宾的消息和图片，我们才知道昨天与蒯大富辩论的人是薄一波副总理。过了两天，薄一波又来看大字报，又遇到蒯大富，他称蒯是“小牛鬼蛇神”。

#### ◇ 参加文化革命报告会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文化革命报告会，北京市各大专院校都派出学生代表参加，每个班级去一个代表。我们清华学生代表队三四百人由校方专车送到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一楼会场坐满满的，二楼也有很多人，我们清华学生因去得早都坐在前排。会议是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召开的，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主持，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主席台上也留有毛泽东的位置，起初他没有到场。下午3点半会议开始，李雪峰首先宣读撤消进驻学校工作组的文件。接着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分别讲话。当时我带本子认真作了记录，准备回去向同学们传达。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后都举手高呼口号，刘少奇是在邓小平讲话后发言的，讲毕他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话音刚落，毛主席从主席台右侧走了上来，全场数千学生一看到毛主席来了，顿时掌声雷动，全场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响成一片。

毛泽东面带微笑向学生们频频招手，当走到主席台前董必武面前时停步与他亲切握手，又走几步看到徐特立老人，又热情地与徐老握手。之后他面向学生挥手致意，一直走到主席台的左侧，然后返回走至中间向主席台上就坐的中央领导们挥挥手就离开了。在场同学都为见到伟大领袖而激情澎湃，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期望主席能回来讲几句话。这时，江青走到主席台前，她倡议大家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说着她就指挥、领唱。可是热情澎湃的学生们一个劲地高呼口号，江青的建议被狂热的口号声淹没了。5分钟、10分钟，再没有出现主席的高大身影。这时，走上来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十多岁女孩，她走到台前仍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渐渐冷静下来的学生们终于意识到毛主席不会再来了，这才跟着女孩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后散会。

第二天，学校将会上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的讲话录音在学校广播上播放，连放多次。主要内容是为什么撤消工作组；工作组是怎么派来的——当时毛主席没有在北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研究决定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决定撤消。我将录音与我的笔记核对了一下，我的记录基本是准确的，但是我不明白：没有了工作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怎么搞？蒋南翔是国家高教局局长兼校长，过去并不经常来校，只有在新生入学典礼、毕业典礼、春季学生运动会来校。工作组来之后批判他是资产阶级治校。现在说工作组领导运动是错误的，错在哪里？学校的运动谁来领导？难道让蒯大富们来领导吗？我的心里乱糟糟的。

#### ◇ 周总理找我们座谈

参加文化革命报告会的一天，要吃中饭时，工作队来找我，说到甲所（党委办公地点）参加座谈会，可能有中央首长参加。我想已是中午，座谈会时间不会长的，就将饭菜票给同学们请同学替我打一下饭，等会后回来吃。到那里得知是周总理邀请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我一听着了急，我身穿着圆领汗衫怎能去人民大会堂见总理？还有一个同学穿的是背心，也要

回宿舍换衣服，可是工作组的同志不让，我们只好就这样乘车去了人民大会堂。通知参加座谈会的十个人去了九个，人员有贺鹏飞、刘涛、乔宗淮、苏法德、张南茂、朱金根等人。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里，我们等待总理来开会。这时，工作人员得知我们没吃午饭，立即安排了午饭。饭后，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你们已经等一会了，再继续等吧。刚才又来一批学生，总理和他们先谈了。你们如着急可以参观一下人民大会堂。”于是，我们饶有兴趣地在大会堂四处参观了一番。

下午5时左右，总理送走座谈的学生后，立即召集我们开座谈会。地点在黑龙江厅，一张长桌两侧各摆放四张椅子，桌前边放一张椅子，对面放两张椅子。我们进厅还未坐定，就见身着中山装的周总理匆匆进了门，我们立即站起来热烈鼓掌。总理面带微笑依次与我们热情握手，他看到贺鹏飞、刘涛、乔宗淮，打趣地说：“你们也来了。”然后他坐到前边的单张椅子上，我们依次坐在长桌前，我是末座，靠在总理左边。我们有一人未来，因此我的身边还空一个座位。总理还未讲话，陶铸推门进来说：“总理呀！我在那边和科技系统人员开会。”总理回答道：“噢！你跟大家好好讲讲！”待陶铸出门后，总理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上面写着我们同学名单的纸条，从右向左开始询问各人的姓名、系科班级、籍贯、家庭成分等，刚说几句，工作人员进来对总理说：“小平同志想来听听。”总理说：“哦，那你叫他来。”一两分钟后，邓小平到了，我们连忙站起来要和他握手。邓小平向大家摆摆手，说道：“坐下来，不拉手了！”说着他就坐到我身边的空座位上，又掏出雪茄烟，边抽烟边听我们座谈。

总理第一个问朱金根同学，朱说：“我是工程化学系的，与蒯大富同班，江苏省某县人。”总理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说省，就讲县，我会知道你是哪个省的。”随后，总理一口就说出朱金根家在扬州西北，有多少里。我们惊讶总理的记忆力，全国2000多个县他都能清晰地记得。临到刘少奇之女刘涛时，他亲切地喊她“涛涛”。刘涛回答总理的话后，立即向总理提意见道：“总理，我认为今后籍贯要改革，我连湖南边也未沾过。”刘少奇是湖南宁乡人，因此他的子女籍贯都填湖南人。总理听了指着贺鹏飞、乔宗淮说：“噢，你们三个人两个是延安出生的，一个是重庆出生的，是出生于革命圣地，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四旧’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啊？要改，到下一代人再说吧！你们这一代就不改革了。我的籍贯是浙江绍兴，祖父迁到淮安来，籍贯还是浙江绍兴。12岁离开淮安，我今年68岁了，你看我现在还有苏北口音嘛，这就是家乡对我的影响啦！”总理又问贺龙之子贺鹏飞，管他叫“小龙”，贺也一一作答。后又问乔冠华之子乔宗淮：“小淮子，你家是什么成分？”乔答道：“地主。”总理追问道：“你家有多少地？”乔回答道：“不知道。”总理又说：“多少地也不知道呀！回去问问你爸爸，你家是大地主。”总理又问：“盐城有‘两乔’，你知道不知道？”乔宗淮摇头说不知道，总理说：“‘两乔’你怎么不知道呢？一个是你爸爸，一个是胡乔木。”

我靠近总理的左首，所以最后才问到我，我说：“我是涟水人。”总理立即问：“你是涟水中学毕业的吗？”我回答道：“不是的，我是淮阴中学毕业的。”总理说：“噢，淮阴中学很大嘛。”询问之后，总理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来座谈，主要是昨天的大会上，毛主席要我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今天就请你们来谈谈工作组的问题，你们对工作组怎么看，你们就怎么说，畅所欲言嘛。”然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谈起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拥护工作组的，所以，全说工作组的好话，会场气氛活跃，也谈得很随便，没有一点拘束，不知不觉到了深夜还意犹未尽。这时总理一看手表，叫道：“11点45分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然后，总理安排大家吃晚饭，我们齐声道：“总理和我们一起去吃吧！”总理回答道：“我回家去吃，我和小平同志还有点事情，你们去吃吧！”之后还不忘向工作人员交待：“给清华打电话，来车把他们接回去。”总理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令我们十分敬佩。饭后，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交了饭菜票，我们感到奇怪，这里吃饭还要钱？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原来人民大会堂就餐是不要交钱的，因为在这里就餐的不是国家领导人，就是人民的有功之臣。可是有一次总理在这里

就餐后，他带头交饭菜票，并且规定：以后不管是谁，在这里吃饭要交钱，按吃的多少交饭菜票。我们听了，更加敬佩总理廉洁奉公的好品质。

#### ◇ 总理建议让蒯大富发言

1966年8月2日下午5点多钟，学校通知我们5个学生代表到校党委办公室集中。到了那里，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总理请你们来开座谈会，现在正在会议室里与革筹小组（人员有贺鹏飞、刘涛、乔宗淮、张南茂）座谈，你们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深夜11点钟左右，他们谈话结束，我们才进入会议室。当我们走进会议室，总理和一位工作人员迎上来，总理一边握手，一边向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我们的姓名、籍贯、家庭成份等情况。我们五人的情况无一差错，总理惊人的记忆力真让人敬佩。

总理介绍之后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位女同学突然走到他身边，蹲下来掏出一本笔记本说：“总理，这首歌怎么样？”说着递给总理看，笔记本上她才抄的一首“拿起笔当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的歌曲。总理说道：“你唱一遍给我听听。”她回答：“才抄的，我还会唱。”总理饶有兴趣地接过笔记本看着词谱，脚在地上点着节奏哼了两句，说：“不错嘛！很好唱。”我们没想到日理万机的总理还会唱歌。第二天，这位女同学将这首歌曲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礼堂前边的大字报宣传栏里，还把总理的话写在上边：“不错嘛！很好唱。”这首歌迅速在全国被唱红。

接着，总理对大家说：“今天，我又请你们来，主要谈谈蒯大富的问题，怎么看的就怎么说，只准摆事实、讲道理，不准扣帽子，各抒己见。”当时，我们都说蒯大富不好，列举好多事实，说明他不好，不得人心，总理很耐心地倾听着。座谈结束时已是凌晨5时左右了，总理对我们说：“我马上到你们清华大学开会，要工作组组长叶林做检查，我要亲自参加。会上，我还要让蒯大富同学发言。”听了总理的话，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嚷了起来：“你要叫大会上蒯大富发言，我们也要发言。”总理说：“我看你们就算了。革筹小组开始也和你们一样，也要发言，他们已被我说服了，他们不发言了。”我们坚持说，只要蒯大富发言我们一定要发言。总理拗不过我们，就说：“好吧！你们要发言，用什么题目？哪个发言？明天下午5时之前告诉我。”

#### ◇ 清华操场上的万人大会

总理走后，我们认真准备了发言材料，蒯大富的什么错误由谁批驳，几个人进行分工，最后由我作综合性的总结发言，我忙得一天一夜没睡觉。1966年8月4日晚饭后在清华大学东操场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周恩来总理来了，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也来了很多。我们是准备发言的学生代表，坐在会场第一排，我看到总理夫人邓颖超也来了，她没有坐在主席台上，我出于尊重将自己的凳子让给了她。

会议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主持，首先由工作组组长叶林（原国家冶金部副部长）作检讨，他检讨工作组的错误之后，就是蒯大富发言，他讲工作队如何如何不好，引起学生们的反感，会场一片起哄声。这时主持会议的李雪峰站起来说：“同志们让他把话讲完，同志们让他把话讲完。”这样反复几次，费了很长时间蒯大富的话才讲完。之后由我们拥护工作组的人发言，关于对蒯大富的称呼问题，我们研究根据蒯大富的态度，如果态度好就称他为同志，不好就称他蒯大富同学，恶劣就直呼其名。从刚才的发言来看，我们一致认为他的态度恶劣，就不加任何称呼而直呼其名了。我们列举事实让群众给他戴帽子，举一个事实后就问会场上学生：“同学们，这是什么行为？”下边的绝大多数学生异口同声地高呼：“反革命！”就这样，举一事问一次，会场气氛热烈，多次高呼：“反革命！”我们拥护工作组的一个同学发言后，再由反工作组的蒯派同学发言，相互进行辩论，他们的发言得不到师生的拥护，时常被学生不满声所打断。主持



人李雪峰不断地说：“同学们，让他把话说完。”在蒯派的第三个同学发言后，周总理站起来了，因为不断有纸条递上去，其中有一张纸条上写着：“这个会议是谁安排的？这是一个阴谋。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周总理生气了，大声地向全场人员念这个纸条后，严肃地说：“这个会是我安排的。我没有阴谋，是阳谋。”说着，他指着身后大声说：“你们看，这里一片小轿车，都是我请来的客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省市的领导都来了，我把他们请来看看工作组到底怎么样？以前同学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吗？工作组来有多长时间啊？你看，学生的对立情绪就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的话说完后会场一片安静，蒯大富一派的人发言再也没人起哄了。后来得知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参会人员基本都来听会了，这个会也成了这次中央全会的一个内容。根据事前分工，我们反对蒯派的四个同学讲后，由我作最后的综合性发言，可是因会议时间拖得太长，我的综合发言被取消了。

学生发言后是总理讲话，他说：“我是为蒯大富同学来平反的。”我们认为蒯大富反工作组是不对的，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虽然这一阶段大报小报上，天天有蒯大富的消息，也不能表明他就是正确的，现在总理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态，我们从思想上是想不通的，但是我们信任总理，他说的还能有错吗？

总理讲话之后，董必武讲了话，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打毛主席语录仗，拿这条语录去打那条语录。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系统地、完整地学，不能断章取义。我跟随主席革命几十年了，脱口而出的话有时就不符合主席的思想。因此，运用主席语录要慎重。”董老讲话后，学生们要求邓小平讲话，他不愿讲但又无法推却，就站起来说了几句。他说自己就说三句话：一是刚才总理说了很好的话；二是按董老讲的要完整地学习毛主席语录；三是“你们要把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搞好”。邓小平讲话时间很短，这时已是深夜十一二时，主持人宣布散会，这时学生兴犹未尽，热情地涌上主席台与总理握手。当时正下着小雨，总理不厌其烦，与踊跃上前的学生一一握手，至很晚才走。

第二天是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决裂，从此，全国“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走向混乱。

□ 原载《钟山风雨》2014年第1期

~~~~~

【文革一页】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 何 兵 •

文革期间，国家一度对法院军事管制，军人们雄纠纠地开进了法院。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他们怎样审案？

（一）审判的戏剧化

军人许恩荣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案件审批领导小组”组长，此前是解放军66军副参谋长。他回忆：

“1968年1月，天津市军管会将一批案件公布，发出‘致全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要求群众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召开大规模的公判大会。设总会场、主会场和多个分会场，用电话线联网。犯人被钉上脚镣，押赴会场，从西监狱到民园体育场的总会场约20公里，沿

途戒备森严，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警车护送。到达会场后，被押上高高的审判台。有的犯人受不了惊吓，大小便失禁，拉了一裤裆，或者瘫成一团，两个民警也扶不起来。由‘新生医院’的医生，隔着裤子注射一针‘吗啡’，使其兴奋起来，维持到宣判完毕。”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宣判官’。我以响亮的嗓音，浓厚的山西口音向到会的约160万群众，宣讲‘判决词’。我用高音喇叭同时宣布，对杀人犯张贵元等八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

军人们的广场审判，重规模、气势和震慑力。审判的戏剧性和表演性，被夸张到极致。大案、要案、尤其是死刑，要集中宣判和执行，这样才有规模效应并产生轰动。死刑宣判的过程尽可能拉长，以利于充分表演：犯人钉上脚镣，沿途20公里戒备森严，摩托车开道，警车护送，高高的审判台……可以想象观众的兴奋、胆寒和喧嚣。犯人“瘫成一团，拉了一裤裆”，证明权力可以打碎灵魂，将人碾成碎末。围观和旁听的达170万人，宛如“沙场秋点兵”，满足将军们的“边塞情怀”。

再看一例。

南京下放知青陈卓然，制作了60份反对江青的标语，贴到大街上，全城轰动。后主谋倪××将陈出卖。陈被捕19天后处以死刑。公判大会上，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宣布陈卓然死刑立即执行后，故意拉长声音宣布：“首犯倪××，罪大恶极，理应判处死刑。念其有重大检举立功表现——稍作停顿——当场释放！”然后一法警手持巨大剪刀，“咔嚓”舞动着走上主席台，将倪××反绑着的绳索剪断，将其当场放掉。

宣判官“故意拉长”语音，法警“咔嚓”，舞动着“巨大剪刀”。一个“立即执行”，一个“当场释放”。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军人们有效地向公众宣示着权力的爱与恨。

作为“集市司法”或者说“戏剧司法”，一年只能演几场，通常选在重大节日如国庆节。一旦你案件被挑中交由群众讨论并公审，说明你的案情有表演价值，通常意味着“你死定了”。

（二）领导说了算

军人们不懂法，判决如何服众？好在当年不讲法治，无人有此古怪的疑问。许恩荣说：“我们这些军代表都是从自己的感性认识出发，和与其他类似案件相比较就定下来了。”

他说的是普通案件。对于大案，当年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由军管会将案件交给社会上一定范围内的“革命群众”讨论。“革命群众”审判你，你还能不服么？另一方面，走领导路线，案件报领导层层审批。人民群众见不到被告，见不到材料，“鸡一嘴，鸭一嘴”，没个准星。群众路线是形式，最终领导说了算。

南京下放知青任毅，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歌中唱到：“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莫斯科广播电台将歌曲改成男声小合唱，用作对华策反宣传。1970年2月，他因“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罪名而被捕。

他回忆说：“1970年3月7日在南京三中批斗时，我已经知道我的案子被印发成材料在南京人民群众中讨论。当局讲‘杀’，老百姓还敢讲‘不杀’？从逮捕的那天开始，我就被钉在死刑柱上了。”

他猜对了，但也错了。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向南京市委写“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任毅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毒甚广，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2〕

剧情出现转折。1970年7月31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批复，“判处任犯有期徒刑十年”，让南京市革委会很沮丧。据说许世友将军坚决不同意。

他遇上了吉星，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另一位天津革命小将，遇上丧门星，被远在北京的江青要了命。

1967年9月，天津某造反派头头林××和另一头头程××，查抄地毯五厂的“铁梭战斗队”，俘获女负责人王××，关押一夜。该女称“遭到林造反等人轮奸”，并将控诉录音带送到北京。江青亲自指示：“要抓起来枪毙”。市公安局法制科副科长刘乃强认为“轮奸不成立”。江青不断催办，军管会于1968年12月以“包庇反革命的顽固分子”罪名，先将刘乃强判了8年。后王××翻供，说控诉轮奸是因为仇恨。医院检查，王“未婚外阴处女膜完整”。但江青还在督促，军管会在“犯人不供，证人不证，被害人控告”的情况下，于1970年5月21日判处林死刑，立即执行，从犯程××死缓。1979年1月天津高院复查，程××无罪释放，林××恢复名誉，给家属生活费3000元。〔3〕

（三）军人特色的审判

军人审案，不依法律，他们以什么标准判断？他们的法宝是“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许恩荣说：“我们进驻之初，军队领导谆谆教导我们，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是个首要的问题，如一时分辨不清，一律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事情不能做‘绝了’。”

这个“法宝”到实践中，好象用处不大，因为“敌我”本身不好区分。

许恩荣回忆，1969年12月，天津市军管会审批小组认定，由个体医护人员为主组成的“天津市联合门诊部”，为地下黑医院，是反革命组织，负责人鲁××被判死缓。后经复查，又认为这是一个“个体劳动者组织”，无罪。〔4〕

我分析了天津市河东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的98份判决，大致归纳出以下几个审判特色：

一、不用法言法语。军管会的判决，不用法言法语，大量运用口头语言、报刊语言，充斥着时代的政治话语。天津河东区军管会（69）军公判字第11号判词：“石犯在反动日记中叫嚣：‘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的气还没有出，我的雪海深仇还没有报’，幻想什么‘世界结束’‘天门降临’‘大审判开始’妄图变天复辟……”石某被判七年。（69）军公审字第61号判词说：冯犯厌恶劳动，思想蜕化，偷窃倒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判处盗窃集团销赃主犯冯振东有期徒刑十年。”〔5〕

二、对思想犯的惩处重于强奸犯。思想犯属于政治犯，是敌我矛盾。为何对强奸犯轻处，甚至比今天还轻？

张某“竟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处有期徒刑七年。潘犯“刻骨仇恨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幻想变天。扬言散发反动传单，企图对革命群众进行报复，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处有期徒刑十年。王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极为仇视，散布反动言论，造谣诬蔑，蛊惑人心……”处有期徒刑七年。

作为比较，都犯多次奸污长女，还将十三岁的二女儿奸污。此外以看热带鱼、打扑克等手段引诱，奸污邻居幼女一名，猥亵幼女多名，处有期徒刑三年。李犯奸污九岁幼女夏某某，还以看病打针为名，奸污八岁幼女金某某两次。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

三、同罪不同罚。仍以奸淫幼女为例。于犯奸污幼女四人，猥亵幼女八人，鸡奸幼童一人，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钟犯奸污幼女五人，猥亵幼女多人，处有期徒刑八年。史犯奸污幼女一名，猥亵幼女十余名，多次强奸呆傻十七岁少女董某某，被处有期徒刑三年。李犯1969年猥亵幼女三人，1968年还奸污过其中的两人，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四、不区分犯罪事实与坏人坏事，没有追诉时效概念，爱翻历史烂账。

贾犯是匪民社党天津县监察委员、部长。解放后坚持反革命立场，多次被管制劳教。一九六九年多次公开散布极为恶毒的反革命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少年儿童灌输反动思想，教唱反动歌曲……乘机猥亵幼女。”他因现行反革命，被处无期徒刑。可是他究竟有哪些行为构成犯罪呢？

叶犯系地主子弟，在家不务正业，思想腐化，好逸恶劳。在我国暂时困难期间，长途贩运，套购倒卖大油、电池、烟叶、香油等物资，从中获利五百余元。1962年至1964年又与盗窃集团首犯高连弟勾结在一起，先后在沧县、丰南县等地销赃，分得赃款2200余元……依法判处盗窃集团销赃犯叶某有期徒刑八年。叶犯的倒卖行为与销赃行为，完全是两个不同事实。前者并非犯罪行为，但依然被纳入判词。他被判八年，可能一个原因，他是“地主子弟”。（6）

军人审判时期，社会治安如何？许恩荣回忆，贪污、受贿极少，刑事发案率有所下降。1967年全天津市刑事案件发案5221件，破案率为61.7%，1968年发案4981件，较上年减少240件，（降率2.1%），破案率68.5%，破案率提高6.5%。天津周围的农村，近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许恩荣认为，这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也不排除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有关。

参考文献：

（1）许恩荣：《征途：一个平凡人的奉献》。打印稿。页227—228。

（2）任毅：《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86。

（3）许恩荣：《征途：一个平凡人的奉献》。打印稿。页228。

（4）许恩荣：《征途：一个平凡人的奉献》。打印稿，页227。

（5）引自判决书原文。

（6）以上案例皆引自天津市河东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判决书原文。

□ 原载《腾讯网》

~~~~~  
【史实辨析】

最后的晚会——1971年五一节晚会史料辨析

• 张光渝 •

自新中国成立，每年都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两次庆祝晚会：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和十一国庆节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党政军各界负责人、各界英模和代表人物以及外宾一起观赏节日焰火。广场上，则有数十万各单位和学校的群众围成一个个圈子，唱歌跳舞联欢。这个传统一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戛然而止。

自1971年国庆节前突然取消阅兵、群众游行和焰火晚会，直到1984年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时，才举行了十三年后的第一次国庆庆典和焰火晚会。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型庆祝活动再也没有恢复，1971年五一节晚会，就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五一节晚会。

这一年的五一晚会，值得回顾。这不但因为它是最后一次五一晚会，还因为它是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和党章规定的最高领袖接班人的林彪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围绕林彪和这次晚会，又生出一些违反史实的说法。

一、杜修贤的“林彪迟到”说和“仅此一张”照片说

杜修贤和顾保孜合著《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红镜头》）中，杜修贤以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身份详细回忆了林彪在这次五一节晚会上“迟到”和提前离去的意外事件，被各种报刊和出版物引为史料证据，也使得这一次五一晚会更加引人关注。

杜修贤在书中提到，他亲眼目睹了林彪在那次焰火晚会上迟到，又提前离去的经过。他还详细叙述了他无意中抢拍了“唯一”一张林彪在晚会上的照片，因而避免了一场宣传上的麻烦。

杜修贤在《红镜头》中说：1971年五一焰火晚会，“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我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身体状况。可能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过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共和国红镜头》上册 第197—198页）

这段关键的叙述有三个要点：

第一、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在天安门观礼台同桌落座后，林彪仍然没到，桌前空着一把椅子。

第二、周恩来发现林彪迟到，十分焦急，派秘书去打听情况。

第三、林彪“慢条斯理”地到达后，从杜修贤身边经过，杜闻到了林彪身上的一股“怪味”，并称那是林彪注射吗啡的结果。杜修贤说，林彪是在总理的再三电话催促下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接着，杜修贤又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他无意中拍摄了当晚林彪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的过程。因为林彪的提前离去，杜修贤又讲到了周恩来闻讯发火批评记者的过程：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周恩来马上让杜修贤把其他摄像记者找来，问他们是否拍下了毛和林在一起的镜头。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活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第203—204页）

杜修贤的这段话也有三个要点：

第一、因为林彪的“迟到”和突然离去，杜修贤只拍到了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一张照片。

第二、周恩来紧急追问其他电影电视记者，他们竟然没有来得及拍哪怕一个镜头，交了“白卷”。

第三、杜修贤通过周恩来之口，说林彪身体不好，因为“上午参加”了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的活动，晚上不想来，是周恩来动员来的。

五一晚会的照片第二天要见报，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镜头，会酿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怎么办呢？杜修贤讲到了周恩来的“紧急善后”——午夜时分，杜修贤奉召前往中南海：

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我，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我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我坐，我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啊，就这一张。”

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我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我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第204页）

在这段话中，杜修贤再次证实：他拍摄的那张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是当晚晚会上唯一的一张两人合照。第二天（5月2日）的报纸上，也只刊登了“仅此一张”的毛林合影。

而且，连五一晚会的电视新闻中，也只得借用了杜修贤的那张固定画面的摄影照片，用以填补毛林在一起的镜头空缺，掩饰林彪的“迟到”和“不辞而别”。

本人亲历，白纸黑字，生动详实，这应当是真实事件吧。

## 二、真相：林彪没有迟到，照片不止一张

个人亲历和回忆，固然是珍贵的历史参考资料。但如果有条件能与历史事件的原始记录相比较，就可能发现其中的不实不确之处，有的，两者还可能完全相反。很遗憾，杜修贤讲述的1971年五一晚会之事，就与真相完全相反。

1971年距今四十余年，当事者还相当多。从历史角度说，时间也不算长。由于科学技术条件的支持，那个晚会不但留下了新闻报道，而且留下了纪录片视频资料。这是最权威的原始记录。

看报纸。笔者专门查找了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这一天的报纸头版套红竖排标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庆“五一”》。报道内容的开头是：“新华社一日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今晚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一起，欢度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然而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不仅刊登了据杜修贤说的他偶然拍到的“仅此一张”的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照片，而且还有第二张照片：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众军人手持语录本的热列欢迎。毛、林、周三人的着装均与五一当天焰火晚会时的着装一致；毛穿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林穿军装、呢大衣。照片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全国各大报转载时多了“传真照片”四字。）

很显然，这是杜修贤五一节当晚拍摄的第二张有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镜头的照片。据杜修贤在《红镜头》中说，“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不能随便到跟前，这早已是一条大家知道的不成文规定”。（第197页）五一当晚第一线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镜头的记者）只有杜修贤一人，他至少拍了两张有林彪的照片，怎么说成是“仅此一张”？

更为幸运的是，在互联网上可以方便地查到1971年五一晚会的纪录片视频。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1971年5月联合摄制的《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给了

我们更为明确的真相答案。

这部图像已经褪色的纪录片，在播放到11分01秒的时候，镜头出现的画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鱼贯走出天安门城楼的电梯厅，在场军人和群众手挥语录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彪跟在毛泽东身后，笑着挥动语录，向周围人群致意。接着，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外的门口，先后与从大厅走出来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他外宾握手。林和毛挨得很近，林彪情绪正常，面带微笑。然后，镜头显示毛和林与西哈努克亲王等一起走下台阶，在检阅台护栏前的圆桌边落座。第14分35秒，是林彪在桌边微笑的特写镜头；第19分24秒，又有一个林彪的特写镜头。

以上报刊和视频资料证明：

首先，杜修贤所说林彪迟到一事根本不存在，因为他是和毛泽东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因此，《红镜头》所言周恩来看到桌边空位、焦急寻找林彪，又派秘书去查看，打电话催促等情节，也就完全无法成立；

当然，杜修贤详细描述的有关林彪“慢条斯理”，身带“怪味”，“精神萎靡”等等形容词，可以说是无中生有；

最后，《红镜头》文中，因为摄像记者没有拍到林彪的镜头而遭到周恩来批评责备，周恩来事后与杜修贤讨论如何使用所谓“仅此一张”的照片的说法，就更不可信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叙事失误。亲历者把时间、地点记错，把事情发生的顺序记错，把一些重要情节遗漏等情况，是难免发生的。但像《红镜头》这样将林彪1971年五一节晚会的行为完全凭空想象，以亲历者身份生造许多戏剧化的细节，导致与真相完全相反的结果，还是很少见的。这是为什么呢？

### 三、干扰亲历者回忆真实性的两大因素

回顾往事，特别是政治性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干扰：其一是记忆力的干扰，记混、记漏、记错的情况是很难避免的；其二是先入为主的有倾向性的主观思维障碍。在1971年五一晚会的回忆中，杜修贤可能同时受到了上述两个干扰的影响。

在杜修贤的叙事中，他详细讲了1971年五一节“上午”到天安门城楼拍摄毛泽东和林彪接见领导干部和检阅天安门广场群众游行队伍的事情。他说，林彪跟在毛泽东的后面出现在城楼上，“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第193页）

其实，五一节白天的群众游行活动，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取消了，杜修贤说的这件事根本不存在。1971年的报纸和五一节纪录片也完全没有涉及毛泽东、林彪上午的活动，更谈不上群众游行。而杜修贤却很可能将他晚上拍摄的林彪跟在毛泽东身后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接见干部和各界群众代表的事情，错记成上午，也由此使得林彪“迟到”和“唯一一张”说有了可能。

五一纪录片显示，毛泽东在晚会结束退场时，身后只有周恩来而没有林彪，林确实是提前离去的。这个离去如何发生，是不是“不辞而别”，杜修贤并不知道。他的“惊异”感只是在发现林彪已经离去后才产生的。但既然林“迟到”了，又早退了，拍到“唯一一张”照片的可能



性也就出现了。可能性就这样在回忆中变成了“事实”。

另外，由于林彪的“反面角色”身份，杜修贤在回忆时不经意间或者刻意加入了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如“滑稽”，如“不上照”，如“一脸枯黄”、“萎靡不振”、“浓浓的怪味”等等。从视频资料看，这些主观描述都不存在，我们也无法确认杜修贤在当时就有这样的印象。而一旦叙事者有了这些主观倾向，回忆就容易出现不符合事实的因素。

1971年五一晚会的事情告诉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阅读和研究，要秉持客观、全面的立场，尽可能收集更多方位的信息，加以对比，去伪存真，切忌先入为主，切忌以主观印象和个人好恶判定和剪裁。

□ 原载《昨天》第39期，2014年9月30日

~~~~~

【当事者言】

专职厨师程汝明谈江青（下）

• 程汝明 •

“她这个级别按照标准应该交多少钱？最后结账，该交多少，就交多少”

郑：也不是吃她的钱？

程：虽然不花她的钱，她也不让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同她差不多。因为到外地她交的伙食费比工作人员交得要多。

郑：她不愿意你们吃得好？

程：她要跟工作人员一样地交伙食费，坐一块吃她有可能愿意。怎么办呢？她省钱了。但她那时候交的伙食费多。我认为她多交伙食费是应该的，因为她的工资比工作人员高，再说她吃的东西都是特做的，当然应该多交伙食费。

杨：那时候，开始地方上每天按4毛收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收江青6毛，后来改收她8毛，因为她干部级别高。

李：伙食标准不一样，菜和饭也不一样？

杨：当然工作人员吃的比她差远了。

程：吃的和喝的都不一样，她喝老母鸡汤，工作人员就没有。

李：实际上您这4毛钱吃到的伙食也比市面上同样价格的伙食好？

程：当地有补助啊！我们个人交4毛，还有出差费都交到地方了。

杨：在海南有一次去元帅府，我们是第一次到那儿去，人家管理员跟我说，你们是营以下干部每天交6毛钱，江青是营以上干部每天交8毛钱。我说我们到哪儿也不说我们是营以下的，

我们是排级干部，6毛钱我们交不起。以后我们到哪儿去一般都交4毛钱，当然个别的时候也有交5毛、6毛的，至于她交多少那我们就不管了。

程：有时候我给她交一块三，我不给她少交。怎么办呢？我说人家首长交得多，江青也不能少交。

杨：1970年在庐山开会，江青住在一层，我住在二层。有一次她突然到了二层，看我们吃饭。正好那天的饭还不错，吃的肉丁包子，还有一碗甲鱼汤。她问：“你们吃什么？”我说吃包子。她说吃什么包子？“是肉丁的。”别看她不吃（肉丁不是有肥肉吗？她不吃肥肉），但她非要尝尝，咬了一口。

还问：“这是什么汤啊？”一看是甲鱼汤。她什么也没说，就下去了。接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叫汪东兴赶快来，说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把我们给收买了，这个事要汪调查清楚，看收到什么程度啦？后来汪东兴和程世清两个人联名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不是收买他们，他们是在大食堂吃饭，都是一样的。汪东兴见了江青，又当面给她解释，这才算完了。

李：程师傅，江青出门也带着您吧？

程：对，带着。

李：那在外地吃饭也是您去做，比如她交一块三也好，交8毛也好，她就将这钱交给当地？

程：当地接待部门的财务就收了。

李：据您当时的估算，您每天给她做的饭，以她这8毛也好，一块三也好，同实际价格相比，有距离吗？

程：有点距离，但相差不大，因为当地有补贴。再说每天按8毛钱标准交伙食费的情况，几乎没有。一般的我经手的，都是按国家规定交。我们每到一地，首先就问人家，她这个级别在这儿，按照标准应该交多少钱？最后结账，该交多少，就交多少。最多的我们曾按每天两元的标准给她交伙食费，工作人员交8毛。

李：那就是说在北京家里吃饭也就是这个水平？

程：哎，你算假如每天按一块三交伙食费，1个月要支付近40块钱。她到外地工作或视察应该算出差，她每天拿出一块三了，她也有出差费啊，她每天也有出差补助费，把这两项的钱加在一起，同在北京家里支付的钱差不多。计划着花钱，在她这个生活标准里，当时一天也得花3块多钱到4块钱。因为她有她的补助，再加上她本人拿出来的钱，她的伙食标准就比较高了。说实话，江青她也不在乎这个，咱们也不能给她少交，我把这个关把得挺严的。她临走的时候提出要什么吃的东西，都给她付钱，买什么都在伙食费账上。

“她很注意饭菜的营养、新鲜和卫生，从来不吃剩饭剩菜”

李：江青她本人是不是也比较注意这些事啊？

程：对，她自己想着这个。

李：比如您要带筐水果什么的回来，行吗？

程：不行，她吃的水果一般都是从北京带去的，她吃的苹果是印度苹果，当地还没有这种印度苹果。

李：当时那印度苹果贵吗？

程：跟咱们国光、富士的价钱差不多，但国光没有印度的个儿大，它是绿的，一点不酸，现在这品种没有了，以前玉泉山下边有那么几棵这种苹果树。

杨：咱们是否可以这么说，那时候的江青啊，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还算廉洁啦！

李：是啊，要说江青政治上的事咱们先不管她，就这些事而论，她本人确实是廉洁啊！这些事上应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叫一般老百姓想，以江青的身份，那得吃多么高级的东西！还不得跟封建社会的娘娘那一张嘴似的，那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还不是想吃啥有啥！当然，与当时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相比，那已经是完全两回事了。

程：江青在生活上确实不是堕落的。

郑：那印度苹果也是供应科里供应的？

程：玉泉山咱们警卫局自己栽的有印度苹果树。

郑：也不是专门从印度进来专门给江青个人吃的？

程：不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市场上有印度苹果卖。江青吃的东西，一般来讲，还不是啥都吃。比方说广东的水果品种很多，但她喜欢吃的并不多。她很注意饭菜的营养、新鲜和卫生，从来不吃剩饭剩菜，即使她最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能上顿、下顿连续给她吃。比如，有一年在北戴河她提出要吃西瓜，我就给她要了一个小西瓜，上午我给她切了半个，她几乎都吃光了。下午她提出要同客人一同吃饭，这时我突然想到江青还有吃剩的半个西瓜。按常理江青不吃剩东西，她上午刚吃了西瓜，下午不应再送她吃。但我又一想，这西瓜是她花钱买的，她不吃剩东西，又不说叫别人吃，给她卖了吧，又是在外地，不方便处理，西瓜放久了就坏了，岂不浪费。于是趁下午江青请客人一同吃饭之机，我就将她吃剩的半个西瓜切切端上了饭桌。江青看到西瓜就很不高兴地说：“我上午刚吃的西瓜，下午怎么又给我吃？”实际上，江青不了解我的真实想法，假如她允许我把真实想法告诉她，与她评理，她也得说我做得对——既保证了她的食品安全卫生，又注意了节约，一举两得啊！又比如说，我给她做个熏鸡，我得赶快给她吃，每次让她少吃一点，使她下顿还有胃口，否则一次送好多，她觉得好吃都吃光了，下次再送给她，她也不想吃了。即使让她少吃多餐，最多也超不过三顿。为了给江青节约，她吃不了的东西，我就交给供应科，送大食堂卖了。比如煮汤后的老母鸡，卖也卖不了多少钱，只能象征性地收点费入账。这些事在北京都能处理，如果出差在外地就不好办了。

杨：那煮汤后的鸡肉难吃着呢，跟干柴似的，没油水儿了嘛！

阎：1967年能吃上煮汤后的鸡肉就不错了，我吃过，觉得挺香、挺满意。

郑：那时候有冰箱吗？

程：有冰箱。

李：到各地去也都有冰箱吧？

程：外地的接待宾馆都有。1970年庐山会议时，江青住美庐，用的那冰箱，还是美国的，我还从来没用过这种产品，它底下有个螺丝就是盘丝的，像个窝头似地盘盘着，整个烧红了。这大概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用过的。它也能制冷。

郑：江青除了正常吃饭以外，还吃不吃零食啊？或者吃宵夜？

程：有吃零食的时候，比如说加一次高蛋白，她吃的高蛋白是从美国进口的东西。加工方法就是高蛋白里搁点儿水，搅一搅放在火上一煮就可以了，煮开了以后像粥似的，也不用给加其他东西了。她吃高蛋白的时候，我每次就给她盛一小碗，她吃的也不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搬到钓鱼台住，她就极少同毛主席一起吃饭了”

郑：一般情况下她就一个人吃饭？

程：就她一个人吃，她也不让孩子跟她一起吃。

阎：李讷在大食堂吃饭，不跟她一块吃。

杨：她吃饭的时候，孩子在旁边坐着，也不让孩子吃她的东西。

阎：我们都觉得奇怪，偶尔李讷要跟她一起吃了顿饭，李讷就高兴得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叫我一齐吃饭了”。

李：江青1个月吃饭大概能花多少钱？

程：100块钱左右，她吃的东西都得给她算上。

杨：对，水果啊，点心啊，还有茶叶啊，只要是入口的东西都给她算上。

李：噢，您说这100多块钱还包括茶叶？

程：对，全都给算上了。

郑：当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吃饭不是您给做吧？

程：不是。江青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每顿饭都到机关大食堂去吃，上班不能去吃时，由其他人帮助给打回来。不吃她的，她要剩了我也不吃，我当时也有补助，就在食堂里吃饭。

郑：那江青吃不完，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

程：她吃大米饭每次吃多少我知道，她吃多少我给她做多少，她要说加个人吃饭，我再给她多来一碗儿，她不加入，我就给她蒸那么多。连煤气都得花钱啊，我得给她精打细算。

李：是吗，您说这100块钱还包括煤气哪？

程：不包括。煤气不属于入口的东西，要另外单算。就是水、电不花钱，煤气花钱算她账上。开始钓鱼台里没有用煤气罐的，每天烧那个大炉子，烧的煤那么多，怪浪费的。最后这规矩我给他们破了，江青已经用上煤气罐后，张耀祠还说钓鱼台周围300米以外才能用煤气罐，我说我自己注意点儿，不会出现安全问题。我用煤气快一年了没出事，在钓鱼台住的几个领导的厨师知道后，也着急了，也要求用煤气，很快就都用上了。

李：您觉得这方便是吧？

程：用煤气多方便啊，一开就着，马上就能做饭。使用炉灶要一会儿加煤，一会儿加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火，还不能让它灭了。

郑：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她跟毛主席在一起吃饭吗？

程：“文化大革命”之前，江青也跟毛主席一起吃啊！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搬到钓鱼台住，她就极少同毛主席一起吃饭了。怎么办呢，她在钓鱼台这边办公，主席在中南海那边办公，就没办法在一起吃饭了。就20世纪50年代来说，江青和毛主席每天在一起吃顿饭也不容易，因为他们的作息时间和工作生活习惯不尽相同。江青晚上这顿饭，恰恰是主席的第一顿饭，只有晚上这顿饭，两人才能在一块儿吃，如果没有孩子，就主席和江青两人一起吃。上学的孩子礼拜六晚上回来，可以允许同父母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礼拜天小孩都得到机关食堂去吃。这是主席给规定的，小孩屋子里头不要铺地毯，吃饭要到大食堂。

李：他们一家都在一块儿吃饭热闹吗？

程：小孩们都不敢说话，热闹什么啊！主席问他们什么，他们回答什么，在一块儿吃顿饭，连江青都不敢大声大气。小孩也说在那儿吃饭拘束着呢，不如在厨房这儿舒服——过去小孩一般都在厨房里吃。以后主席不叫他们在那儿吃了，叫他们都到大食堂去吃。

郑：主席跟江青就是早晚在一起吃？

程：主席刚起来第一顿饭算早饭，而江青是晚饭。江青跟主席一起吃一顿饭，这顿饭也不好弄，一顿饭得几个菜，江青的菜和主席的菜得合并，既要主席能吃又要江青也能吃，这时候很难做，菜还得减一个。比如江青一荤一素，主席一荤一素，再加个半荤素的，两个人吃4个菜，很不好做，他俩口味儿不一样，主席的调味儿浓，葱、姜、蒜放得多，江青一点儿不让往里放。

“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给江青做饭，当她的专职厨师”

李：我发现有的电影里毛主席总是边吃饭边拿着文件看，平时也是这样吗？

程：是，有这个习惯。

郑：主席的午饭，也是您给江青做完再给主席做？

程：不，主席有主席的厨师，江青有江青的厨师，各做各的。

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

程：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情况我不知道，而我看到和经历的情况都是这样，主席的厨师负责主席，江青的厨师负责江青，都有分工。我最早的时候跟李锡吾两人专门负责给主席做饭，后来主席将我推荐给江青做饭，他说“火车（整理者按：指毛主席专列）上的程师傅给你做饭适合你，第一他会做西餐，第二他会做点心，第三他做的中西餐的菜你都能吃”。如果没有主席的推荐，江青怎会盯上我？

当时她并不太了解我。可你说她一点也不了解吧，也不是，她还了解一点。怎么了解的呢？就是那时她老跟主席一起吃饭，吃完饭就问：“这是谁做的菜？”老是问，问多了，就对我有所了解，知道专列上有一个程师傅在为主席做饭。经毛主席向她推荐以后，江青心里就更有底了。但真正对我的了解和考察还是从1961年主席过生日这天起。我记得这天江青的厨师因为有事，请假回家了，这样就没有专职厨师给她做饭了。当时给毛主席做饭的除我一个固定的外，还有北京饭店的康师傅、上海一个饭店的邓师傅，他们二人都是比较有名的厨师。江青提出：“我的厨师不在，请你们三位师傅帮我做饭，每人给我做一天。”当时我是厨师长，我就给他们二位师傅做了分工。我说江青第一天的饭由邓师傅做，第二天的饭由康师傅做，第三天的饭由我来做。邓师傅做的第一天的饭，我对他做的饭菜和江青餐后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每顿饭菜江青只吃了一半。对康师傅做的第二天的三顿饭和江青餐后的情况，我也进行了仔细观察，江青吃的情况同第一天相比，没有变化，每顿饭菜也都吃了一半。第三天轮到我，我发现我给江青做的每顿饭菜，她都吃得精光。我知道江青的目的是想换掉原来的厨师，让我们三个人每人给她做一天饭，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实际考察。三天的饭做完了，我知道“要坏事”。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的饭菜都只吃了一半，唯独我做的饭菜她全部吃光，说明我做的饭菜适合她的口味，由此来看，留下我做她的厨师恐怕没跑了。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给江青做饭，当她的专职厨师。

事后，我将上述情况报告了汪东兴。我同他说：“我估计江青要留下我做她的专职厨师。”汪说：“你怎么估计出来？”我就将三人每人给江青做一天饭的情况向他作了叙述，他听后笑了，看来他同意我的判断。以后情况的发展，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李：为什么都不愿意当江青的专职厨师？

程：她那个饭不好做，女同志也事多，婆婆妈妈的，谁都知道她的情况。主席从来不在饭上计较咸了淡了的，他也顾不得。主席吃的东西量也大，吃的东西多厨师就好做。

李：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给江青做饭？

程：我基本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给她做饭了，一做就是16年。

李：您这16年可真不容易！

程：要不很多人见到我都说“你真不简单”！规规矩矩地讲，警卫局的同志，包括张耀祠、汪东兴也佩服我！怎么呢？我给他们少惹多少麻烦啊！那时候如果这个厨师给江青做不好饭，汪东兴一天也安稳不了啊！那时候她厉害着呢，根本没把张耀祠看在眼里，张耀祠怕她怕得厉害！张耀祠那时候要求给她修房子，他叫我进去给她送报告，她火了！她说为什么他自己不来送却让你替他送？这又不是你的事，你给他退回去！

李：退回去什么东西啊？

程：退回去的是报告和修房子的设计图。张耀祠为什么叫我给江青送去啊？他老认为我会对付她。

杨：江青说吃咸了，程师傅就基本不给她搁盐了。程师傅怎么敢这么对付她啊？听程师傅讲的这一段事情后，大家就理解了，江青离不开他。

郑：她也知道程师傅有情绪了，但是她也不敢说，唯恐啥时候撂挑子。假如再换一个人，她觉得远不如程师傅，所以程师傅有资本才不怕她。

程：主席病危的时候，她也在那儿守着，到点回来吃饭。有一天我准备给她做清蒸鱼吃。鱼要放盐早了，口感就没那么松了，放盐早了绝对不行，我等她回来了再放。当有人告诉我，她回来了，我就立即把鱼搁蒸锅里了，结果忘了往鱼里放盐。鱼做好了，端到饭桌上，江青一尝没味，就对护士说把那调料罐儿拿过来，程师傅没放盐，别跟他说。护士下来还是告诉了我，我一听：哎哟！坏了，今天的鱼确实一点盐也没放，忘了！她常跟护士说这样的话，咸了淡了，而对这件事，江青只是向护士提了一句，还不要护士告诉我。我心里还是有不安。一般不用她说，我尽量把饭把菜做好，让她满意，但我也一味地迎合她。

杨：江青从来都叫我“小杨”，也不叫名字，更不叫秘书。而对程师傅，她一直叫“程师傅”，这称呼就不一样。

阎：她住在钓鱼台，到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开会，有时带着程师傅给她做饭，程师傅如果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厨师要打电话问他怎么给江青做饭做菜。程师傅说，他因此还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绰号“遥控”。

程：人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他们都熟了。比如，江青喜欢吃烤鲥鱼，大会堂一直烤不好。现在这个鱼啊大概是比鱼翅还贵呢，一千多一斤，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鱼只有长江和钱塘江出，别的地方还不出，现在钱塘江的鲥鱼少了，到长江那一带有。一般的厨师没见过这种鱼。烤鲥鱼在大会堂的厨师老做不好，做一次不行，再做一次还不行。大会堂的厨师长跟我是老乡，他最后提到餐厅科的科长。他就说你这个鲥鱼到底怎么做的？我说不跟你说了嘛，不行的话我哪天给你们烤一次去。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并不是每次都要我跟她去给她做饭。只要她提出“今天的饭让大会堂的师傅做”，我就可以不用随她到大会堂去了。当她提出“今天你到大会堂给我做饭”，我就得随她到大会堂去。大会堂的师傅没能烤好鲥鱼都是在我没跟江青到大会堂去做饭的情况下，他们烤的。其实江青很少让大会堂的师傅给她做饭。一听说“让大会堂的师傅给她做饭”，大会堂的师傅也“转腰子”。怎么办呢？他们老说做不好江青的饭。我说关键是你们跟她接触的时间短，还不够了解江青，接触时间长了，掌握她的餐饮生活规律了就好了。

郑：大会堂的师傅巴不得你去给她做饭呢。

程：就是啊。我同大会堂有些师傅的关系是很好的，跟钓鱼台的那些师傅的关系也不错，我不像有的人那样“狗仗人势”，如果你属于这类人，人家即使看见你，也当没看见，不理你。其实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江青身边的一个厨师吗？要是换个角度，人家是江青身边的厨师，你跑到大会堂去作厨师，你不是也一样吗？因此，咱得尊重人家，遇事互相商量，互相帮助。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单位厨师的关系相当不错，包括领导一直到下边职工，也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很高的评价。不然，杨银禄、周金铭走了以后，大家不会一

致推举我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党支部书记。

“可能在全国周总理直接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就您这么一个了”

杨：你是终身的党支部书记，谁也不能换。

程：周总理亲自任命的。周总理的苦心，我也明白。什么秘书、警卫、护士江青都批评了，就是没批评我，没点我的名了。总理亲自给我们开会，他说“支部书记叫大师傅当，叫程师傅当”，大家都赞成。

李：可能在全国周总理直接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就您这么一个了。

程：啊，可能还真没有。

杨：当时也只能是他了，我走了以后那个秘书也是个新的，比我还新，对他信不过，怕他干不了，这总理看得特准。

郑：总理当时怎么跟你说？

程：他就说由你当。

阎：总理给你们开会是吧？

程：对，江青叫总理给我们开会，开会的时候周总理说你们这些人得有负责人吧。总理一看我的年龄比其他工作人员都大，老练点儿，他就提出“由程师傅任支部书记”。大家都鼓掌。我这个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么提出来的。

李：这么多年，毛主席、江青那些孩子应该是在您眼前长大的？

程：还真的是，这几个孩子还都不错。

李：这几个孩子小时候什么样啊？这不是“格格”就是“王子”的。

程：比如说毛远新，他一到北京就到我家去看我去。我原来就住西城区草岚子胡同，“文革”后毛远新、李讷、李敏都去过，他们和我关系都不错。

李：听说江青对李敏也还行，没有一般民间说的什么后妈那劲儿的。

程：因为她的地位不同了，她的注意力也不可能用在孩子身上。再说孩子们的生活全靠主席的工资，用不着江青多费心。据我所知，李讷、李敏，还有江青的姐姐，主席一个月都给他们30块钱生活费，此外，主席还经常拿出工资周济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再除去自己的伙食费，他每月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了。主席老给工作人员钱，但是就没给过厨师钱。为什么呢？我在厨师里头拿钱最多，那三个厨师每月工资89.5元，比我少十来块钱，他们同我一样都属于一级厨师，但我比他们多了一份厨师长的钱。在铁道部任厨师长的时候就是这么规定的，有厨师长工资一项。我虽然被调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当厨师，但工资关系一直在铁道部，工资由那里发。

李：毛远新是有传奇经历的人，少年时候怎么样啊？淘气吗？

程：他不淘气，因为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不是太好。跟李敏、李讷的关系还可以，没见他们吵过、闹过。他很少在家里呆着，就是礼拜六回来。

李：礼拜六他们一块儿玩吗？

程：也是回到各个的屋子里头，他们都挺用功的，都是看书。主席给李讷的批示多，因为李讷是学历史的，有时候警卫拿着主席的批示就找李讷来了。大部分都是送到厨房，因为李讷他们都在厨房吃饭。主席的批示我看到过，但什么内容我没印象了。

郑：那么江青骂他们几个人吗？

程：很少。江青在北京住的时候也不多，所以孩子们同她接触也少，当几个孩子上中学出来以后，一放假，毛远新就到江西找他妈去了，李敏也到上海找她妈去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远新他妈朱丹华常来主席这里，我们都认识了，李敏她妈贺子珍这次也到庐山了。

李：您见过吗？

程：那时候没有，都不知道。但不只这一次，主席在上海也见过贺子珍。

李：哪一年啊？

程：不是1959年就是1960年。我跟韩阿福师傅两人那时候就在上海锦江饭店对过俱乐部住着，正在那儿和哨兵一起打扑克，突然警卫出来就说你们小点儿声啊，主席去散步了。他一说主席散步我们就看了看，哎，今天警卫没跟着，前面一个老太太和主席两人往俱乐部去散步去了，我们不知道是谁。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李敏的妈，大概是徐业夫弄车把她接来的。

李：这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程：从来没公开报道过。

杨：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讲毛主席在锦江饭店还是在哪儿见过贺子珍。

程：在锦江饭店对过儿的俱乐部。

杨：在庐山还见过一次。

李：哪次先哪次后啊？

程：我记得庐山那次好像在先，俱乐部这次在后。但是当时即使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只能个别人知道，多数人不知道。

杨：对，我看到的那本书上说，有几天江青对主席很冷淡，说主席旧情不忘。

程：实际啊，主席是旧情不忘。江青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小，为什么呢？包括当地的人，

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会跟她说，给她通风报信，这是绝对的。

郑：说起来，也都是人之常情。谢谢程师傅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些故事！你在最难侍候的江青身边工作长达16年，而且做到“善始善终”，还得到上上下下的尊敬和好评，真不容易！我想，这和你做人的人品和智慧是分不开的，我也向你表示敬意！谢谢你！

□ 《湘潮》2014年第2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